

毛泽东—— 走自己的路

MAOZEDONG ZHOUZIJIDELU

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94071

毛泽东

——走自己的路

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孙克勤

封面设计 闵 敏

毛泽东——走自己的路

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0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80515—935—1/D·124

定价：7.00元

目 录

前言：“走自己的路”光辉思想的形成.....	（ 1 ）
以农村包围城市.....	（ 12 ）
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	（ 36 ）
兵民是胜利之本.....	（ 58 ）
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 86 ）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111 ）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140 ）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173 ）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194 ）
建设广泛的人民民主.....	（ 217 ）
结束语：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 246 ）

前言：“走自己的路”光辉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中国历史的巨人！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特别是他所倡导并为之身体力行的“走自己的路”的光辉思想，闪烁着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睿智与胆略，激发了人们与习惯势力挑战的勇气，打破了中国革命总是模仿别人脚步前进的桎梏，敢于超越一切权威，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胜利。中国人民真正地、彻底地站立了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面前抬得起头，挺得起腰；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严重关头巍然屹立，砥柱中流。

走自己的路的光辉思想，在革命中是指引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航标，在建设中国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①。邓小平以今天的新鲜经验，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概括了群众的创造，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使这一思想更加光辉灿烂，自己的路也愈走愈宽广。

走自己的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就是“中国革命斗争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

首先，走自己的路就是一切决策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坚持

① 邓小平：《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2页。

②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这就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其它国家的经验，需要的是学习与借鉴而不能全盘照搬，我们既不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赞成别国照搬我们的经验。

其次，走自己的路就是一切工作必须自己动手，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靠中国同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今世界又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外援，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利用一切外部力量，但必须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

最后，走自己的路还必须发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注意民族的特点，唤醒民族的奋起，同时，还必须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革命的韧性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走自己的路这一光辉思想原则的形成和确立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历史环境的要求及锤炼，也是领导者特有品格和志气的充分发扬，它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的追求和创造。

一、学习西方的迷途知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亲眼目睹可爱的中国贫困、落后，任人欺辱、宰割，巍巍神州处于风雨飘摇之境。触目惊心的事实激起了

毛泽东以拯救中华为己任的强烈抱负，1910年底取名“子任”就是这种决心的表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首先被西方送来的种种新思潮所裹挟，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拍岸而来时，曾令先进的中国人感到“粲然可观，茅塞顿开”^①，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努力学习西方”^②。这差不多成了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觉醒后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学生学先生，遭到的却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③，于是，“列强侵略”和“西方文明”几乎成为同一事物的两种表达方式，给中国的先进分子造成了憎恶与钦佩交织的困惑心态。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学习西方不断遭到破产，例如，仿效过多党制，结果成了国民党、进步党之间的结党营私，党阀纷争；搞了几次会议，结果成了一群政客的吵吵嚷嚷，你哄我抢，对国民的实际利益一无所补，从西方武库中搬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试过了，失败了。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从学习西方的迷途中觉醒过来。毛泽东等的视线就转向以自己的力量寻找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的解放道路。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中撰文批评了湖南思想界中的有些人，指出：这些人以为“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正如一个小孩子，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④。毛泽东还尖锐地揭示这是一种“空虚的思想”，认为应该“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应该脚踏实地的“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⑤。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创的信中反复列举了他暂时不愿出国而需要

①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2卷2号。

②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0页。

④⑤ 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与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页。

留在国内研究中国实际的重要，他指出：“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所以，“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的情况，开始重视中国实际的研究，并正孕育着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国情着手的重要思想。

五四运动，天降狂飙，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人们曾向往过的“文明”国家却在进行一场强盗战争，人们曾寄希望于讲“公理”的西方国家首脑，却背信弃义地进行着一场强盗式的“分赃”。人们觉悟了！猛醒了！一批渴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终于从学习西方的迷宫中跳了出来。随后，他们又通过反复的争辩、比较与实践，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迷雾”中走出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以俄为师，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的正确途径。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征途。

二、对教条主义恶果的审慎反思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一开始就重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者引上歧途之后，更促使他注重研究中国情况，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问题。他在回顾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后，发现“在这些书本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这种科学态度是极其可贵的。

^①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2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教条主义肆意横行，是有其主客观的原因。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不久，马克思主义正进入它发展的辉煌时期，它“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②。因此，“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便以为有了这个“本本”，就“保障了永久的胜利”^③，滋生和蔓延了教条主义。

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又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④的支持而愈发猖獗。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革命，也对中国革命出过不少错误的主张，特别是它在组织制度上可以干预各国党内部事务的缺陷，就更使得这种错误倾向伴随着组织声势和理论声势显得咄咄逼人。

教条主义在中国的极度蔓延，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长期窒息着中国广大农民，“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⑤。另外，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有着膜拜经典、尊崇圣言之癖，这种唯圣贤之言是听，唯圣言之言是从的保守、闭塞的治学传统，也不能不对后世留有影响。所以，教条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既有社会历史根源，又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推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特别是一些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奉为绝对真理，视苏联经验为不变的模式，一切照搬照抄。这样，苏联实行土地国有，中国党也跟着如法炮制，斯大林向富农发起进攻，中国的富农也跟着倒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毛泽东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8页。

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⑤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霉，苏联党实行的是城市武装起义，中国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遭到拒绝，在不得不承认的情况下，也被冠以“苏维埃”的名称，塞进许多中国无法实行的政策和办法。总之，在必须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棒喝之下，教条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其结果，“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①，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②。

毛泽东等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痛定思痛，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苏联经验进行了审慎的思考。例如，象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就竭力反对过“打洋仗”，但在教条主义者的反“游击主义”的声势下，要求红军去与敌硬打硬拚，结果丢掉了整个苏区，红军被迫长征。象刘少奇等白区工作者也曾愤怒地谴责教条主义者的蛮干，但在“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口号下，要求党员和基本群众到处进行毫无把握的总罢工、总起义、总暴动，结果使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在实际斗争第一线的同志，无一不对教条主义的漂亮词藻以及对苏联模式的绝对有效的鼓吹感到迷惑。毛泽东更以他的睿智和胆略进行了审慎的反思。1929年6月14日，他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写了一封长信，对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来自远方”^③表示十分忧虑，对“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④表示愤慨，所以，毛泽东一面抵制教条主义的错误，一面开创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和办法，特别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早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7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③ 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12期《1929年的毛泽东》。

④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时代和环境的逼迫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开拓出一条自己的路，从实际出发，依靠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又和领导者的品格、气质和胆量是分不开的。

三、领导者睿智和胆略的充分发挥

毛泽东坚持走自己的路，是他在反复的实践斗争中个人智慧和胆略充分发挥的结果。毛泽东说：我有“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事根据的”，“对于这些冤枉和委曲……把它看作是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①。

1928年，当湖南省委在数星期内连发三道指示要毛泽东率红军离开井冈山去参加湘东或湘南起义，这时，“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②。毛泽东毅然采取了迹近违抗的主张，召开了军委、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以会议的一致意见再次向省委要求改变其指示。毛泽东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者明知失败”，失败，意味着人头落地，革命遭殃。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为了形式上去执行上级指示而对革命力量的遭挫无动于衷。毛泽东当时一直处在斗争的最前线，现实的、残酷的、复杂多变的斗争迫使他对上面来的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作出切合实际的抉择，如1927年9月的文家市决策，1930年攻打南昌和长沙计划的不断更改等等。当然，这种做法会引起教条主义者的不满，会引起拘泥于原计划和只会照搬外国模式的人的反对。特别当这部分人还居于领导机关的地位时，惩罚和打击就会接踵而来。

正是在这种种的压力面前练就了一身的胆略和睿智。毛泽东

①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7—8页。

② 毛泽东：《井冈山》，《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0页。

说：我“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①。他还说：“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②。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的志气和才智的充分体现。

对教条主义错误作斗争的艰巨，在于他们自恃有国际力量的干预和支持。斯大林曾说过：“否认它（按：指共产国际）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③。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时起，就把自身置于一个复杂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按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党在处理一切涉外关系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在组织上承认了对共产国际决议“必须执行”^④，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斯大林的干预权。对国际的指示统统加以执行，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因为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常常脱离中国国情，有不少还是错误的。中国的这个客观世界，中国人自己才能真正认识。对国际的指示如果加以拒绝，又有悖于自己是其支部的现状，这就使得双方关系极端复杂。

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胆识解决了这个难题。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凡是正确的就执行，凡是错误的就抵制，当然，这种抵制必须十分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一般情况下，采取不理不睬，“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⑤；有时，则在执行中加以中国式的改造，如土地革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②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8页。

④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4页。

⑤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5页。

命战争时期实行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注入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在舆论上，绝不把双方分歧公布于众，在纠正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又只责备自己。采取这些办法，既维护了与共产国际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使走自己路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走自己的路的艰难还在于习惯势力的顽固抵抗。那些只会照搬书本、只晓得拘泥于传统模式的人，他们对中国革命坚持走自己的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新奇、独特、世界各国从不曾出现过的场面，如革命从农村开始、发动和吸收广大农民参加革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等等，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惊呼“农民势力超过工人将不利于革命”，耽心“离经叛道”。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被他们谥之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他们说成是“山沟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动并依靠农民，被斥为“农民的资本主义”，从实际出发制订的军事战略战术，也被讥为“游击主义”……而且到处去“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毛泽东正是在同这些顽固势力的斗争中“飞渡从容”、“思想横溢”，更坚定地把走自己的路的思想牢牢地树立了起来。

所以，走自己的路是迎着各种习惯势力的挑战，顶住教条主义的种种打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历史和环境的要求，是历史和环境所给予的机遇，更是领导者的品格和气质发展的必然，是领导者靠自己的努力的艰辛创造。“走自己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走自己的路的光辉思想指引着中国命革。一场崭新的、完全靠自己闯出来的、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声有色地表演着。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没有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而

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吸引成批成批的农民参加，农民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众多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教育下，激发出伟大的革命潜力，组织成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不少被教育改造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和党的出色干部，他们经受住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所施加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围攻和迫害，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这的确是旷世未闻、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没有组织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而是首先领导农民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联合其它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也是闻所未闻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而是正确区分出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别制订出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路线与策略路线，既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中间力量，又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和大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没有采取像西方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那套路子，也没有按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办事，而是把革命的领导权置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人民大众，进行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对于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航道。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创举。正是

这些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革命规律、道路、路线和策略的制定，才使中国革命摆脱“左”和右的干扰，甩掉一切旧有模式和习惯势力，冲破教条主义设置的层层障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开始只能基本照搬苏联的做法。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所以，“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②。这是走自己的路的必然反映。

当时，毛泽东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思想政治文化的。探索十分努力，焕发出的思想火花绚丽多彩。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以及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方针，还对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决策等等。诚然，当时的这些探索有它的局限性，特别在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逆转，许多好的主张没有能坚持下去。但是，这个探索中的某些经验、某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某些理论原则有它的普遍意义。这个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了个头。

我们深信，在这个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一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①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转引自《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第31页。

②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转引自《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以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独特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了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这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作了论证，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一、中国革命道路的“误区”

在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走过一段不小的弯路，陷入过两个误区，即：长期合法斗争的误区和城市中心论的误区。

（一）长期合法斗争的误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的大地上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然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在陈独秀领导下，走的是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即先从事长期的合法斗争，以争取群众，

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乃至妄图通过“国民会议”接受全国政权；“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陈独秀这一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使中国革命步入了误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但是，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至二七惨案发生后，各地工会组织遭到封闭，工人运动被迫转入低潮。

1925年是革命大发展的一年，革命潮流从南到北，汹涌澎湃。它的标志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大爆发。这一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的一个巨大的浪涛，是遍及全国震动世界的强大革命潮流。它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无比威力，它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军阀统治者以强有力的打击，大大地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但是，如此伟大的群众运动，却惨遭帝国主义武力的血腥镇压，无力回天。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伐战争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然而，在这一军事斗争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却仍然不注意武装工农，仍然不注重抓军事，而是继续热衷于所谓的通过“国民会议”接受全国政权。北伐战争开始后，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26年7月12日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指出：我们党“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认为“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